

必也正名

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

李小龙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必也正名

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

李小龙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 / 李小龙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7
ISBN 978-7-108-06663-3

I. ①必…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7984 号

责任编辑 王海燕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15 毫米 1/16 印张 31

字 数 437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必也正名乎”——《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序（郭英德）	…… 1
导 论	…… 7
第一节 文言小说正名	…… 10
第二节 白话小说正名	…… 27
第三节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概念之融通	…… 4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渊源与分化	…… 49
第一节 从《汉书·艺文志》看文言小说命名的子史渊源	…… 50
第二节 《史记》诸体对文言小说命名的垂范	…… 55
第三节 记传体与说话体：文言小说命名的两极分化	…… 64
第四节 中国古代小说传、记二体的源流	…… 76
第二章 文言小说集命名例考	…… 99
第一节 《世说新语》命名的渊源、演变及定名困境	…… 101
第二节 《聊斋志异》异名、异称的嬗递及其意义	…… 123
第三节 《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	…… 144

第三章	文言小说单篇作品命名例考	161
第一节	《燕丹子》的命名策略与叙事建构	163
第二节	唐单篇传奇命名考——以《异闻集》为中心	179
第三节	《虬髯客传》异名辨析及其命名的史传渊源	205
第四节	《祁禹传》的文本流传、作者身份及创作命意考论	224
第四章	演义体与传、记体命名格局的建立	247
第一节	《三国演义》命名的演变与定型	248
第二节	《水浒传》命名的含义及其演化	269
第三节	《西游记》命名的渊源	284
第五章	世情小说命名的试探与独立	307
第一节	艳情小说命名的试探	309
第二节	《金瓶梅》命名的渊源及意义	324
第三节	《金瓶梅》式命名的转移与衰落	341
第四节	《红楼梦》命名的叙事策略及多重内涵	356
第六章	小说命名的共时性研究	373
第一节	中国文言小说命名“怪”“奇”考	374
第二节	白话小说三字名经典地位探究	384

第三节 文言小说白名例考 …… 394

第七章 中西小说命名方式比较与互译 …… 405

第一节 中国章回小说与西方长篇小说书名比较研究 …… 407

第二节 从汉化到欧化——西方小说书名中译策略演化例考 …… 420

第三节 中国小说书名英译例考 …… 448

参考文献 …… 461

索引 …… 483

跋 …… 487

『必也正名乎』

——《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序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名字从表面上看都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有时甚至可以简化到不能再简的地步，或者以数字为序（称一、二、三、四等），以天干为序（称甲、乙、丙、丁等），甚至采用“虎儿”“狗儿”之类的小名；或者像“老外”那样，直接借用祖父、父亲的名字，人们为了加以区别，在称呼时加上“老”“大”“小”的标签，如“老约翰”“大约翰”“小约翰”之类。

但是，也正因为名字是一个符号，它就不仅仅具有标识的作用，还蕴含着某种难以言明或者无须言明的特殊意味。用中国的老话说，任何一个名字都隐含着某种“微言大义”；用西方的新词说，任何名字都是一种独特的“有意义的形式”（form with meaning）。名字的确、名字的称呼，乃至名字的更易，往往足以与一个人的性格、命运、遭际等发生种种神秘的关联，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一位少女称一位男性为“叔叔”还是“哥哥”，其中也许就蕴含着相当微妙的情感因素或心理因素，难道不是这

样吗？

尤其对于历史久远的汉字文化来说，“命名”更是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形无形地渗透到当下的文化传播或文化传承之中。在当今网络盛行的时代里，“起名网”“取名网”之类的网站仍然大行其道，风光无限。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只要有一个“匹配”的、“合适”的名字，一个人就可以一生好运，一个组织（公司、学校、机构等）就可以飞黄腾达。而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旦遭逢坎坷，厄运频现，当事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心生疑窦，是否因为名字不“匹配”或者不“合适”？于是就迫不及待地请相士测字算命、改名甚至更姓，祈求鸿运降临。

也许正因为历史上、社会上、文学上“名”和“实”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因缘，所以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语重心长地强调：“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老夫子看来，“名”和“实”之间居然存在着一种车轱辘似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且“名正”居然成为“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措手足”等所有社会行为的发端、基点，这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著名作家张爱玲有一篇趣味盎然的短文《必也正名乎》，文中说道：“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之类）。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张爱玲提醒我们，“小说里的人”颇有“名副其实”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上人名的由来一开始总是不由自主的，而小说中的人名则是作家有意的创造，就像李小龙博士这部书稿所说的，书的名字（当然也包括书中人物的名字）“可完全由作者支配，因而也就更能体现作者的意图”。

我不知道小龙博士在选择“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时候，是否考虑到“名”和“实”之间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我可

以料想到，也许正是书名作为一种符号足以成为揭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内在奥秘的切入点这一想法，引起小龙博士一探究竟的好奇和兴趣。而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好奇和兴趣，恰恰是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触媒。

当然，要将个人的好奇和兴趣转化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里需要的是研究者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而这种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对于多年沉浸传统文化、精研古代典籍的小龙博士来说，恰恰是他的长项，因此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将个人的好奇和兴趣转化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问题。

在多年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小龙博士敏锐地揭示：“小说书名虽然似乎不参与叙事世界的进展……却实实在在是叙事世界得以建构的入口。”从这一“入口”步入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世界，入门既正，收获必丰。因此，在2010年，小龙博士就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关系研究”，旨在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抉发“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之“名”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一斑窥全豹，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不同于西方叙事传统的民族特征，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历时七年之久，小龙博士向学界奉献出《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这部厚实的著作。

我认为，在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抉发“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之“名”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课题的提出和解答，实际上派生出两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追问方式：第一，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现象，与西方小说相比较，是否具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如果有，从何而来，如何呈现，有何价值？第二，每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其他小说相比较，是否具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如果有，从何而来，如何呈现，有何价值？要而言之，前者的提出和解答根基于一种宏观的中外文化比较视野，而后者的提出和解答则根基于一种微观的小说文本阐释方式。

恰恰是这两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追问方式，构成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

结构框架。全书共七章，第一章和第六章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渊源流变和体制特征，第七章为中外小说命名方式的比较，这三章采取宏观的中外文化比较视野，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的形成、特征和价值，揭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第二章至第五章则采取微观的小说文本阐释方式，选择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单篇作品、明代“四大奇书”、艳情小说、《红楼梦》等一些特色鲜明的个案，细致地考察古代小说的命名与其叙事世界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并不认为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结构框架已经达到“无懈可击”或“完美无瑕”的地步。如果由其他学者来展开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结构框架。比如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框架，从中外小说命名方式的比较入手，揭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方式的独特现象，然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角度分别加以考察，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接着选取一些个案进行文本阐释，借以支撑或深化由整体考察得出的结论。又比如采用“先分论后总论”的结构框架，从中国小说命名史上选取若干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个案，一一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抽绎、归纳出古代小说命名的一些带有共性的特征，进而在中外文化比较视野中考察这些特征的历史渊源，揭示这些特征的文化内涵。在学术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结构框架，大而化之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研究者不同的思考路径和不同的治学兴趣，而这恰恰构成一个成熟的研究者的精神素质和学术修养。我想，聪明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结构框架中，体察到他的思考路径和治学兴趣，进而认知他的精神素质和学术修养。

而最让我欣悦的是，小龙博士在这部著作中拈出的众多学术问题及其巧妙的解答方式，鲜明地彰显出他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常常给读者以深刻的启发。

例如，中国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书与子书，甚至可以说原本就蕴含于史书与子书之中，是史书与子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早就已经成为小说研究界的共识。但是，从史书与子书的文化传统入手，深入透视小说命名的“胎记”乃至“基因”，这却是前人未曾涉足的学术问题。小龙博士由此切入，撰写了

“从《汉书·艺文志》看文言小说命名的子史渊源”和“《史记》诸体对文言小说命名的垂范”两节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又如，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命名史上，呈现出一种对“三字名”的强烈偏好和趋向，“三字名”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是浏览中国古代小说史，尤其是浏览小说书目，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或许因为“熟视之若无睹”，从未将“三字名”及其生成渊源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小龙博士偏偏将这一众人“习矣而不察焉”的现象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撰写“白话小说三字名经典地位探究”一节，深入探讨，引发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在中国传统中，人名、地名等大多是“三字名”，由自有含义的两个字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姓”的类名构成；而古书的书名，也多为“二字名”加上一个“体字”的组合，形成“三字名”。而且，古书的书名，与人名的命名方式“姓+名”相反，而与地名的命名方式“名+姓”相同，采用的是“类名后置”的方式。有的学者凭主观经验简单地断言，中国文化“姓在名前”，体现出对群体性的“第一关注”，而西方文化“名在姓前”，体现出对个体性的“第一关注”，这两种传统判然有别，“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以及西方人的宗教性”。小龙博士仅举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名与地名的不同命名方式，就足以解构这样的论断。其实，从命名方式前后易位的自如与自由，也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特征。

类似的例证在小龙博士的这部著作中在在皆是，无须我一一列举，细心的读者不难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随处得到会心的体悟。

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发现问题远远难于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提问”原本就隐含着“解答”，因此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而能不能发现问题，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无中生有”可以说是一切学术问题的唯一来源与途径。因此，能不能“无中生有”，便成为考查一位学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基本标准。

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清楚地了解到，小龙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始终葆有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正是一位擅长于“无中生有”的优秀

学者。继深得学界好评的《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之后，小龙博士又奉献出《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这部丰厚的著作，学术道路在他的面前伸展得如此宽广、如此深远，而且还将继续宽广而深远地伸展开来。这的确让我由衷地欣慰，也由衷地钦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发扬光大，不正有赖于一批又一批像小龙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的自强不息、奋力精进吗？

是为序。

郭英德

2017年2月16日

导 论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传统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许多方面，对其进行详尽且着眼于中外文化比较的研究将为深刻把握中西方叙事文学之异同，从而更好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命名，无论是人的名字，还是书的名字，都希望既文约义丰，又典雅端正。把中国古代小说的书名与中国人的姓名并置讨论亦有原因，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家类的书名来看，最早的小说命名实即以人名为书名（详参第一章第一节）。当然，这种相提并论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可以将人名与书名在体制上的相通之处拿来类比，以助理解；二是亦可表明书名亦与人名一样，其间蕴有奥义可以挖掘。

就第一点来说，中国人的姓名以三字为主，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书名相符（相关讨论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中国人姓名中有一个字较为固定，那就是姓，因为每个人的姓氏都是从家族那里继承而来的，对于姓名的拥有者

甚至他的父母来说，都是不可选择的；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书名中也有一个字并不需要太费精力，那就是书名最后的那个文体标识用字（这也是与西方小说书名在体制上最大的不同，参见本书第七章），每位小说家都会根据自己作品的具体情况，加上一点自己的喜好与读音、字形之间的搭配在“录”“志”“传”“记”之类字中选择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看作书名中的“姓”，本书将其称为“体字”。与此同时，很多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书名还多有一个与人取名相类的地方，即古时人名一般都会有一字表示行辈，这个字大多在家谱中已经定好，世俗称之为“排行”，顾炎武《日知录》有“排行”一条即云“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①，这里的“二名”指的是除姓之外用二字名者；文言小说集的书名也有类似的现象，那就是书名中除了体字以标识其书文体面貌之外，还会有一个字来表示其文的艺术倾向，我们可以相应地将其称为文言小说集命名的“谱字”（相关讨论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就第二点来说，古人的文集中，经常会有“字说”之类的文章，虽从功能上看只是冠礼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就是为别人的字号进行“笺注”，把隐含在字号里的微言大义发挥出来。其实，古代小说的书名也同样是古人精心择取的，也需要进行“字说”式的阐释与研讨。

正因如此，中国古典小说的命名方式也便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叙事文学的某些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其《小说的艺术》中曾指出，“小说作品的名字也是文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读者接触文本的第一部分，因此，一部小说能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书名肩负着重大的责任”^②。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理论性的论述，但有大量的实例来证明书名的重要。如冯梦龙（1574—1646）《古今谭概》一书，其初刊本前有梅之炳序，隆重地解释书名由来，从“谭言微中，可以解纷”开始，做了一通

①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334页。

② [英]戴维·洛奇著，卢丽安译《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29页。

发挥，然后引冯氏语云“世何可深谭，谭其一二无患者，是谓‘概’”，梅氏又对云“吾将以子之谭，概子之所未谭”，可知作者与序作者对此名的认可度均很高。然而，据李渔为此书所改之《古今笑史》作序时说：“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悬之国门，奚裨乎。”^①知其原本因书名稍僻而颇受冷遇，改名后才大行于世。由此可见，小说书名虽然似乎不参与叙事世界的进展（在书籍贫乏的时候，很多人阅读的小说无头无尾，更不知其名，但却并不影响读者对其叙事世界的欣赏），却实实在在是叙事世界得以建构的入口。

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命名还有一定程度的忽略，有些作品的命名得到了一些关注，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却少有对所有中国古典小说命名进行梳理的研究，如果不从理论的高度来解析这一形式特征的话，就无法揭示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中的诸多问题。而且，对这一课题的观照还必须贯注一种文化比较的目光和面向叙事世界建构的意识：因为如果没有前者，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特点；没有后者，就无法透过命名的研究把目光投注到文体上去。

这一课题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因为恰恰在命名这一文体特征上，包含着复杂的文体基因，对它们的研究自然会加深我们对叙事文体的认识，也可窥见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特之处。

在讨论各种小说的具体命名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命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命名进行一番梳理。其中，对“小说”命名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摆脱来自西方的“小说”观念，回归中华文化自身的小说传统中去理解古代小说的命名现象。至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则共同组成本书对中国古代小说命名考察的框架。因此，我们在导论中，先对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定名做一番理论上的梳理。

^①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55—656、660页。

第一节

文言小说正名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更革使我们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拥有了新的目光，但在这种西方化的新目光下，传统的小说文体遭到了误解甚至歪曲——这对中国古典小说两大系统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白话小说而言，暗中的改天换地却被表面的认同所遮蔽；而对于文言小说来说，则理所当然地被漠视、被边缘化，甚至被削足适履。所以，对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小说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来理解并讨论文言小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视域问题，它制约着文言小说研究的方方面面。因此，本节力图为文言小说正名。

一、文言小说概念的确立

正如从鲁迅先生（1881—1936）以来的诸多研究者所称引的那样，在中国

文化典籍中，第一次提到“小说”的是《庄子》，其《外物》篇中讲述了任公子的奇异故事，最后说明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道理，其“小说”实即字面所示之含义，即与圣贤大道相对的街谈巷议、浅识小语。事实上，在《庄子》前后，许多先秦典籍都有大致相类之名，如《庄子》又以“小言”^①称之，《荀子》则言“小家珍说”^②，名虽不同，其实则一。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小说”作为文体之名的被择用不过是它比众多备选的名称更幸运罢了。当然，在《庄子》这里，“小说”一词尚非文体指称，但其指称的现象却在后世逐渐演进为文体，因此这一名称也便标示了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的特征——可以说，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系统中，小说文体一直就没有摆脱“小说”原意的牢笼，而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小说文体的核心特征。

庄子所言虽无文体之意，但就《庄子》一书而言，其风格已十分接近小说——就是任公子那一篇便有强烈的小说意味。过常宝先生认为庄子“三言”“建构了《庄子》文体形态的基础”，并极具启发性地指出其最主要的“日出”之“卮言”实即“优语”，并找到《庄子》与“优语”在文献上的联系，即《逍遥游》中所提及“齐谐”之书，认为其为“俳谐之书”，亦即优语。^③事实上，《庄子》原文云“齐谐者，志怪者也”，而“志怪”正为六朝文言小说之一体，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也曾引《魏略》云曹植（192—232）“诵俳优小说数千言”^④，此外唐人刘知几（661—721）《史通》中亦有“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⑤之语，可知数者似二而一的关系。虽然，《庄子》此处的“志怪”未必具有文体意义，但数处互证，则可知当时文体概念虽未清

①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483—484页。

② [战国]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925页。

③ 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11、312页。

④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1，第603页。

⑤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54页。